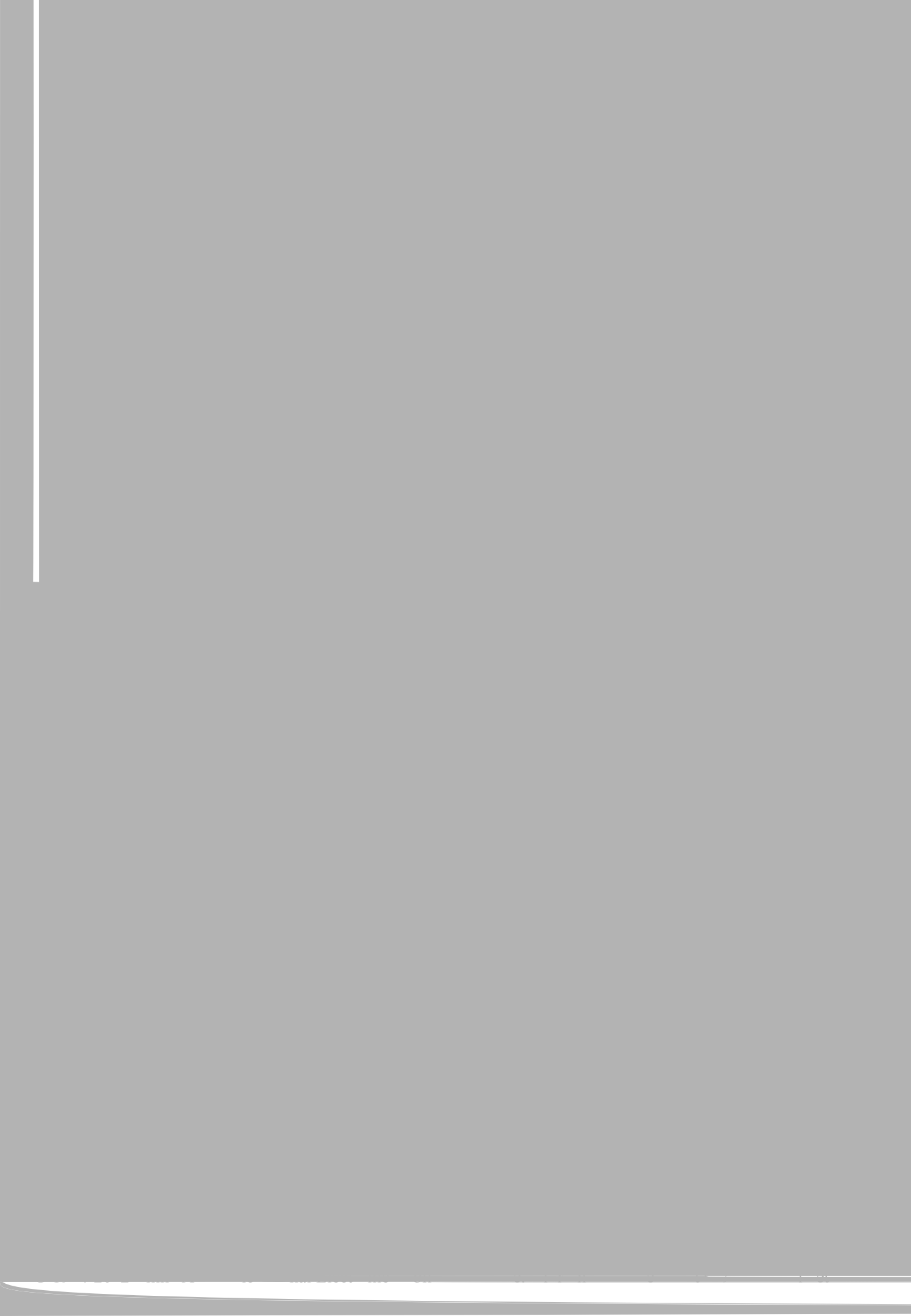


说明其在言辞和行动两方面皆有优秀的表现!① 这很可能是与希腊古风时代以来的口述传统及其表演文化对公开演说能力所提出的特别要求有关!至古典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修昔底德笔下的伯利克里"他被评价为"在言行两方面皆有伟大的才能"② 而且"修昔底德还特别强调"伯利克里能够将自己在演说中的提议成功转化为实际行动!③ 根据现代学者尤尼斯 %bK;F&的分析"德谟斯提尼也似乎有意仿照修昔底德的以上描述"将自己塑造为伯利克里式的政治家!④ 此外"言与行还类似于名与实的关系"作为衡量行为或事件的标准!比如欧里庇得斯'阿尔刻提斯(中所谓"言词上 %A%&而非行动上 %A%&的朋友"⑤ 再如"修昔底德笔下的忒拜人曾经表示"所需要的应该是行动 %A&&'而非言词 %A&&'好的行为无需长篇大论"恶行才需要言词予以掩盖!⑥ 基于这种思维模式"古希腊政治演说中的"演说"与"行动"主题则成为"言"与"行"对应范畴的一种特殊运用形式"与前举诸例的不同在于"它主要不是用来对个别政治家的行为进行品评"而是指向雅典民众!修昔底德笔下的政治家"如克里昂和亚西比德"皆在演说中对此有所涉及"使之成为古希腊演说术常用的修辞策 %A%&而德谟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辞则最为集中地呈现了这种"言"与"行"对应关系"其中的"言"不但专指特定场合的公民大会演说"更引申为民众在公民大会中参与政治商议的方式"与德谟斯提尼要求民众采取的必要"行动"形成对比!

公元前480年"由于弗基斯 %OEF&占领德尔菲而引发所谓"第三次神圣战争"雅典与斯巴达支持弗基斯"弗基斯的敌人忒拜则寻求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 %CDRW&的援助"后者开始插手中部希腊事务弗基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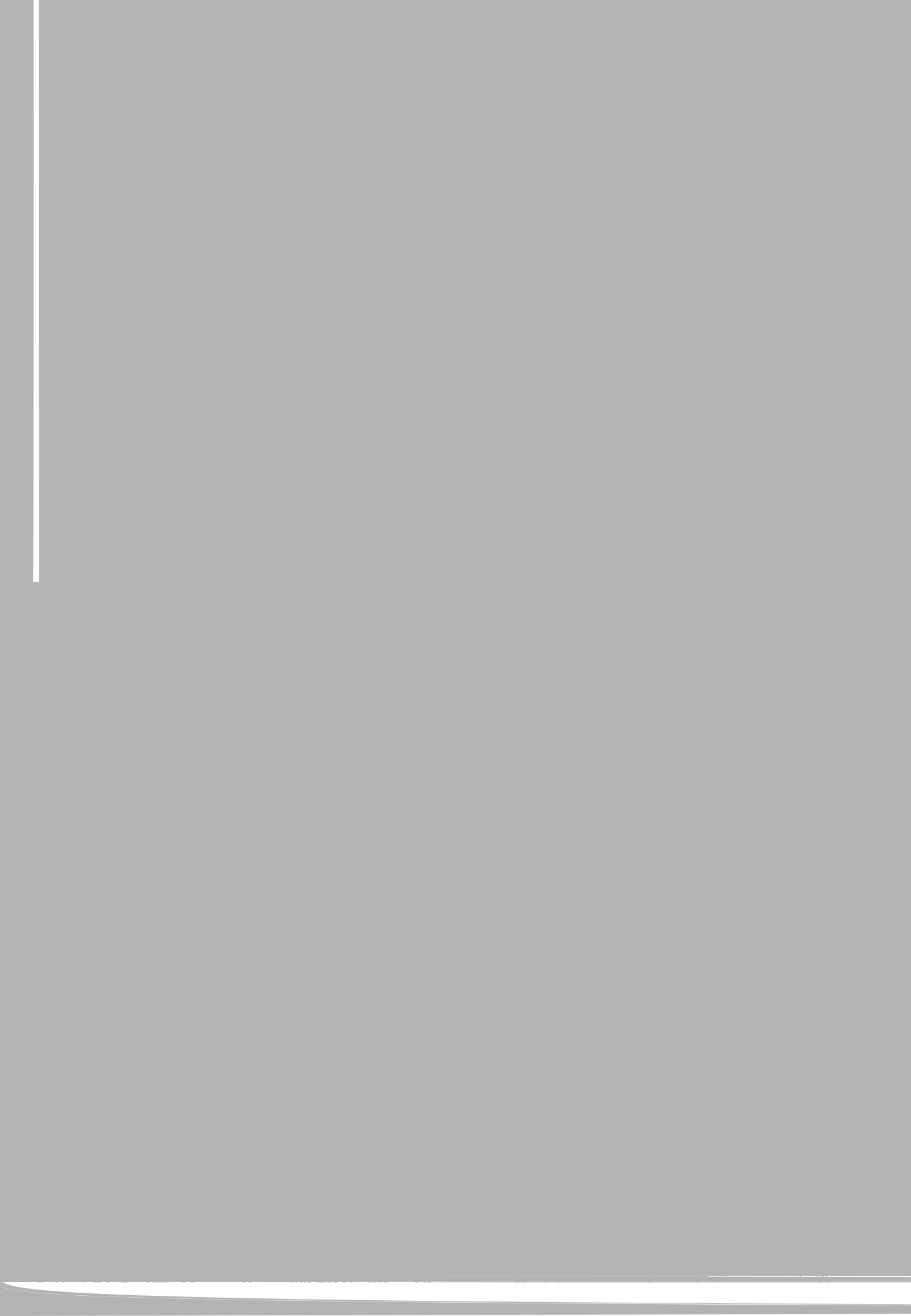


洞察，他之所以如此议论雅典的政治商议方式，是为了向听众表明，他本人具有必要的批判智慧，并将这种智慧以有益的方式应用于政治活动，以此表现自己作为提议者的权威性以及动机的正当性。^① 不过，笔者认为，德谟斯提尼这一修辞策略的目的还不止于此，他对民众政治参与方式的批评更在于试图塑造民众的政治角色，让民众意识到，他们并不只是公民大会演说现场的听众，而更是城邦事务方面的“行动者”。

在第三篇《反腓力辞》的结尾处，德谟斯提尼说，如果每个人都只“坐着”（*καθήμενος*）追求自己的喜好，考虑自己如何避免采取行动（*ἐπιβουλεύω*），那么也就不会再有“行动者”（*ἄνθρωπος ἐνεργητικὸς*）。^② 这里的“坐着”即指坐在公民大会现场听取演说，德谟斯提尼利用对“坐”这一具体动作的强调而将民众的注意力引向他们听取演说的公民大会现场，试图要求民众以“行动者”的角色意识参与公民大会的政治商议活动。

民众“坐”在公民大会现场的表述在另外两篇《反腓力辞》中也得到反复重申，并且始终和“演说”与“行动”的对应关系主题结合在一起。第一篇《反腓力辞》批评道，当腓力二世不断实现其野心的时候，雅典民众却“迟疑而呆坐不动”（*ἀπορροῦντες καὶ καθήμενοι*）。^③ 这里用 *ἀπορροῦντες*（迟疑着）与 *καθήμενοι*（坐着）两个分词生动地描绘了民众参与政治商议的方式，其中，*καθήμενοι* 即指民众坐在公民大会现场





到！“商议者”与“将军”实际上已处于分裂的状态！其具体表现就是民众对军事事务的漠不关心。他批评说：民众表决选出各类军事长官！只是为了让他们在市集广场上像泥偶一样进行表演！却不是到战场上作战^①。德谟斯提尼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众只考虑自己在城邦中的舒适生活。他将雅典的节日庆典与军事筹备加以对比。前者有着财政支持和缜密确定的计划！后者不但缺乏财政供给！而且往往仓促进行！结果延误了“行动的时机”。^②他还指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民众将战事的失利归咎于将军！导致将军经常受到审判！却不敢战死疆场！这也是可耻的。所以！德谟斯提尼最后提出要求！雅典民众应该作为公民兵参加战争！在战场上监督军事行动！这样！他们对公共事务的了解便不再只是听取演说！而是亲历亲为！因此也就能够在掌握真相的情况下“回到自己的城邦”对将军进行述职审查^③。这里的“回到自己的城邦”与前面的“在城邦中”相呼应！都是为了突出“在城邦中”作为“商议者”的民众与派遣在外的“将军”之间在政治职能方面的差异。德谟斯提尼提醒民众！这种差异不应演变为分裂！而需要通过行动加以弥合。对此！他在不久之后的第二篇（奥林图斯辞）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民众有必要实现“共同”的古希腊语中！“共同”有“共同”之义！也就是说！在德谟斯提尼看来！民众必须作为“一致的行动者”采取共同的行动。

第二篇（奥林图斯辞）同样论及“商议者”与“将军”之间的分裂。民众派出的将军只为个人利益从事战争！将军与士兵获得报酬！城邦的公共事务却陷于困境。当民众审判将军时！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便仅根据他们的申辩演说而放过他们^④。德谟斯提尼进一步指出这种分裂的严重危害。如果一部分人像暴君一样发布命令！另一部分人出资装备战舰+交纳战争税并且参军作战！再有一部人则只是投票判决这些出资参战的人们！那么！任何必要的行动皆无法实施^⑤。此处所批评的已经不仅是“商议者”与“将军”之间的分裂状态！而且暗指参与政治商议和法庭审判的民众。

法律的保护，不得挪作他用。因此，德谟斯提尼在这里要求废除有关保护“观剧基金”的法律。^① 为了阐释这项提议，他特别指出，“观剧基金”是将本来用于军事的款项发放给“留在城邦中的人们”（*τοῖς ἐν τῇ πόλει*）。^② 我们注意到，此处再次出现 *ἐν τῇ πόλει*，也就是重申了“城邦中”

民身份认同的体现。根据德谟斯提尼后来的诉讼演说《使团辞》(公元前346年)的说法,欧布鲁斯在迫使雅典民众接受《腓罗克拉底和平协定》的时候,甚至将“观剧基金”作为其说服策略的王牌,以近乎威胁的口吻警告民众,若不接受埃斯基尼斯(Ἐσκήνης)和腓罗克拉底有关和平协定的提议,就只能以废除“观剧基金”为代价,必须二者择一。^①和平协定最终果然获得通过,这说明,对“观剧基金”的维护在当时的确已经深入人心。而且,这种状态应该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37年代末期。

德谟斯提尼的一系列《反腓力辞》和《奥林图斯辞》正是集中发表在公元前346年至公元前337年期间,也就是在他推行反马其顿政策遭受巨大阻力的时期。^②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演说辞中所呈现出的必然是在德谟斯提尼看来最具说服效力的修辞策略。“演说”与“行动”的主题以及“一致的行动者”的角色塑造,便包含在其中,而且如此频繁的反复运用,可见它所受到的高度重视。如上文所述,德谟斯提尼为了实施反马其顿政策而提出的财政改革措施,尤其是废除“观剧基金”的建议,将被视为对民主政治的破坏而遭受强烈反对,这会成为他在发表公民大会演说时所面临的来自于民众方面的最大阻力。于是,他一方面指责个别政治家利用“观剧基金”限制民众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才真正是剥夺民众的权力;另一方面,通过将民众的政治角色塑造为“一致的行动者”,从而为自己的提议寻求更坚实的依据,即古希腊城邦体制的根本原则。德谟斯提尼强调,民众之所以要采取一致的行动,是为了防止他所谓的分裂状态,从前面的引文来看,这主要存在于“商议者”、军人和负责审判的陪审员之间,也就是民众当中具有不同政治职能的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差异和分裂,而正是此处所列举的这三种职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比喻为动物的灵魂。《政治学》中指出,类似动物灵魂的部分,就是战争职能(πολεμική)、审判职能(δικαστική)和商议职能(πραγματική),它们或者由同一些人承担,或者分别属于不同的群体。^③由此来看,德谟斯提尼的关注点已经超越了特定的民主政体,而上升到城邦得以存在的核心问题。同时,他要求“所有人”都为城邦履行相同的责任,其实就是要求承担不同职能的公民群体必须在行动中达成“一致”(ἑνότης),这也吻合于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城邦属性:它是一个“一致的共同体”(κοινωνία)。^④可以说,对城邦本质的这种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希腊人的普遍认识,能够使德谟斯提尼的演说更具说服力。

关于这种修辞策略,因为德谟斯提尼同时代其他政治家的公民大会演说辞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无法了解它在更广范围内的运用情况。不过,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证明德谟斯提尼对“一致”和“行动”的强调源于雅典公

① JHG4BCHHF >&+"# N17# 6B<1' - , ! 2# ,并参见 NEB3HP LAFB, ' *AS JKHD4 L; SA: JHG4BCHHF AP BCHMCHBE 4 XABA P *HBA ! "# \$71' %017D*5 &17, WD=#' #, | 4=#, ! ""%, R=#%=

② 关于德谟斯提尼存世演说辞的时间排列,参见 J4KDF L = LAEJ4<HD, /#B* +/#& +/# >, 1*, R=# = 汉森推测,德谟斯提尼的存世公民大会演说辞之所以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可能是由于当时雅典民众并未接受他的反马其顿政策,故而以文本形式发表演说辞,用来宣传自己的政策,而到公元前337年代民众普遍接受其政策时,则无需再发表这类演说辞。见 L4HF gHGA gAFH, ! "#. +/#&& /#B*Q 10 %&+"# . 4# *2 /#B* +/#& : H, 5Q5#, 9,%&0% 7# 1&8R8#*74, R' =

③

④

民大会演说的传统。修昔底德笔下的亚西比德为了说服民众发动西西里远征，也面临着与德谟斯提尼相似的阻碍，并且运用了与之相似的修辞策略。在记载其演说内容之前，修昔底德特别说明民众对亚西比德的一般看法：由于他热爱赛马，生活奢侈，具有很高的权势，又往往做出违法的行为，因此多数人担心他主张西西里远征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僭主。^① 亚西比德的提议演说将有破坏民主政治之嫌，所以，他在演说的开始部分首先为自己张扬炫耀的生活方式加以辩护，声称他参加赛马和提供合唱队捐助是为了提高城邦的名誉。然后他将话题转向讨论平等问题，他认为，能力和地位差异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正当的。^② 我们知道，平等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③ 而亚西比德的论调很可能会遭受民众的质疑。不过，当转入西西里远征的主题以后，他也像德谟斯提尼那样绕开民主政体，而诉求于更具普遍性的城邦存在的根本原则。他先是向雅典民众介绍西西里地区各城邦的劣势所在，特别指出，那些城邦中的每个人都想着如何利用演说（*ῥῆτορας*）和暴动从公家获利，像这样的民众是无法达成统一意见，也不可能投入一致行动（*οὐδὲν ἑνωμένως*）。^④ 通过这种方式的描述，亚西比德将西西里各城邦树立为典型的反面形象，之后又以同样的标准对雅典民众提出积极要求：各种人——包括次等的、中等的和擅于深思熟虑的人——只有联合起来才会发挥出最大的力量；而城邦也应当习惯于不以言辞而以行动（*ἔργῳ*）来捍卫它自己。^⑤ 我们注意到，这里不但涉及“演说”与“行动”的对比，还更明确地表达出对“一致”原则的强调，它们体现了古希腊人所公认的城邦属性及其存在的基本前提，在亚西比德的此次演说中构成修辞策略的关键环节，为演说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从而强化其说服效果。德谟斯提尼则继承了这种修辞策略，将“演说”与“行动”的关系充分展开，并依据城邦的“一致”原则，使之最终演绎为对民众政治角色的塑造。在这一修辞传统中，他所提出的“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很可能会得到雅典民众的认同，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而具体表现出来。

四、结 论

综合本文的分析来看，德谟斯提尼在公民大会演说中激励雅典民众采取实际行动，并且总是将“行动”与“演说”对立起随

[(演)-80(说)] TJ /F243-T1-1 1 Tf 0 Tr 9.703505 0 0 9.703505 0 30.516086 30.

更为重要的是，与某次个别演说中的劝勉、激励相比，民众的政治角色意识一旦形成，它对城邦政治运作的影响则更加深远。根据现存的德谟斯提尼公民大会演说辞来看，他在尽力说服民众接受其反马其顿政策的十余年间，不断以同样的方式塑造着民众的政治角色，在此过程中，他将每次公民大会演说现场的当下性与城邦政治原则和社会问题的普遍性结合在一起，并且反复重申。这一方面使民众在每一次参与政治商议时得以反思那些普遍原则和社会问题，理解自身在城邦政治生活整体中扮演的角色，从而通过不断地参与政治商议实践逐渐形成长效性的政治角色意识；另一方面，这种角色意识作为民众政治商议实践的认知基础，反过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邦政策的总体趋势。我们有理由认为，经过德谟斯提尼十余年的努力，雅典民众的凝聚力得以维系，为他们日后终于以实际行动接受反马其顿政策提供了某种保障。

最后，有必要指出，本文着重从古希腊演说术修辞策略的角度，尝试探讨德谟斯提尼如何通过公民大会演说来塑造雅典民众作为“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及其对民主政治运作可能具有的积极作用；而笔者所分析的这些演说辞也的确反映出政治家试图调控和矫正民众参与城邦政治商议的方式。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到，演说在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提供这种保障功能的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内在特征的集中体现。演说对于雅典政治事务

BCBGF=7B,] <HKI PBAcHAFB4KFAADFF 4 BCHKI PBA PI ^F 4 P]]HIB^8KR, <H
];I PBOBCE4BGR4SHFCAWHARFBWHW-k 4 BHCALFBAG 4 BHFPHBGAWGHIB=

Japanese Decisionmakers' Convergence on the National Policy of Invading China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XAI ^@DA ^(#')

6]B8BC1HB-G98#(UEPHB PIRB-BC]ABBQBBCH3RAHHEA9IHBOPHEADFCP
AR4EQ4 'I4SRAF;4 a GAIBIAEH4 3RAKF' L4 ^DA AP LAECSA ;IB8BPa <AFA
]ABB4 4WB<CHGI ^; GRBAEH]4B GDBG HDBF A PKEHFW ^4WB GHIF;I PEF;4 Z
GACI ^ 4]4B;A H5